

徐子悦

文学创作研究

徐 型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丰子恺文学创作研究

徐 型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新帮

封面设计:蒋薇薇

西部文丛(三)

丰子恺文学创作研究

徐 型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奎屯市北京西路 504 号 邮编:833200)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7 字数:150 千字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ISBN7—5425—0473—8/I·194 定价:(全套)86.00 元

本册:12.00 元

写在前面

1898年11月9日（阴历9月26日），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丰同裕染坊的楼上，诞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丰子恺。

丰子恺从小受儒家学说的深刻影响，30岁以后又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居士。他一生在文艺园地里辛勤耕耘，硕果累累，是一位集绘画、文学、音乐、书法等多种艺术才能于一身的不可多得的文艺全才，同时又是一位优秀的文艺理论家、艺术教育家和翻译家。1962年，丰子恺在回顾自己的文艺生活时，曾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四十岁以前）是多样的，绘画、文学、音乐都感兴趣。……后期疏远绘画与音乐，偏好文学。”但“综合看来，我对文学，兴趣特别浓厚。”^①可见，文学创作在丰子恺的全部文艺创作活动中占有特殊地位。

在各种文学样式中，丰子恺使用得最多的是随笔散文，共有300多篇。他的随笔散文创作约开始于1922年，先后结集出版的，解放前主要有《缘缘堂随笔》、《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丰子恺创作选》、《缘缘堂再笔》、《漫文漫画》、《甘美的回味》、《子恺近作散文集》、《率真集》等，解放后在1957年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从他过去已发表的随笔中选出59篇又编成《缘缘堂随笔》一书出版。作者生前编定但未出版的，有《新缘缘堂随

^① 《作画好比写文章》，1962年。

笔》、《缘缘堂续笔》两本，前者收 1956—1963 年间的作品，绝大部分在报刊杂志公开发表过；后者写于 1971—1973 年，纯属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地下活动”，直到 1983 年才在丰一吟编的《缘缘堂随笔集》中部分发表，全部发表是在写完以后 20 年，1992 年出版的《丰子恺文集》中了。此外还有大量散见于各种报刊杂志的单篇文章，以及儿童文学、诗词、小说等作品。

我从小喜欢文学，后来学的是文学，现在又在从事文学教学工作。早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从家中的旧书里看到了丰子恺的漫画和随笔散文，深深地被它们吸引住了。但是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丰子恺作品几乎看不到了，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陆陆续续看到有丰子恺的随笔散文选集出版，当时引为遗憾的，是看不到丰子恺的文学创作全貌。可喜的是，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做了一件大好事，从 1990 年到 1992 年出版了 7 卷本的《丰子恺文集》，收集了丰子恺的全部文学作品、艺术理论著作以及日记、书信，为教学工作和科研工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帮助下，我又同丰子恺的幼女丰一吟女士以及国内的丰子恺研究者建立了联系，受到很多教益。有了这些客观条件，我结合教学研读丰子恺著作，逐渐有些心得体会，整理成文，就成为这本小书。

对丰子恺的文学创作，历来国内外研究者不少，研究成果也颇为丰硕。但是山不厌高，海不厌深，作为一名丰子恺著作爱好者，我愿意把自己的浅见提出来与同好者共同探讨，请求指教，以便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目 录

写在前面	(1)
1. 儒学根柢 佛学熏陶	(1)
2. 源于生活 反映现实	(13)
3. 先德后文 德艺双馨	(26)
4. 心系大众 致力普及	(38)
5. 歌颂童真 批判现实	(49)
6. 皈依佛教 护生护心	(59)
7. 关心疾苦 揭露丑恶	(72)
8. 反对侵略 热爱祖国	(78)
9. “二重人格” 时代烙印	(88)
10. 暂离尘世 撰写《续笔》	(95)
11. 借鉴绘画 文画俱佳	(106)
12. 率真自然 个性鲜明	(119)
13. 寓庄于谐 情趣盎然	(129)
14. 对比强烈 爱憎分明	(141)
15. 人物描写 形神毕肖	(146)
16. 儿童文学 培育后代	(156)
17. 诗词创作 丰富多彩	(172)
18. 试作小说 讥讽世情	(186)
结束语	(190)
附录：略谈丰子恺的艺术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92)
丰子恺年谱	(197)

1. 儒学根柢 佛学熏陶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丰子恺是一位比较特殊的艺术家。一方面，他是一位富于爱国热情，具有高尚人格的优秀知识分子，在漫画、散文创作方面做出了重大成绩；另一方面，与同时代的另外一些文艺家相比，他从进入青年时代以后，世界观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发展，部分作品没有能紧跟时代的步伐，甚至落后于时代。这是为什么？在研究他的文艺创作之前，这个问题不能不先行解决。

—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且把他与同乡茅盾兄弟比较一下：茅盾的故乡是浙江桐乡县乌镇，丰子恺的故乡是浙江崇德县石门湾（1958年并入桐乡县），两地相距仅几十里。茅盾生于1896年，丰子恺生于1898年，比茅盾小二岁；茅盾的父亲是前清秀才，丰子恺的父亲是前清举人，茅盾和丰子恺幼年时代都曾受儒家经典的影响。可以说，他们在童年、少年时代所处的历史环境都相似甚至相同。但是茅盾很早就接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洗礼，接受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在1921年二三月间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一大”后成为全国最早的五十几个党员之一。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认识，他的作品善于刻画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揭

示含蕴其中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动向。丰子恺早年与茅盾没有直接交往，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却是好朋友，而沈泽民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与领导者之一。与茅盾、沈泽民比较，丰子恺的思想却一直没有显著变化，他一生离政治较远，身上有较浓的士大夫气息，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他的漫画和散文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旧社会的丑恶现象，但深度和广度都不够，而且晚年回思少作，“深悔讽刺之徒增口业而窃喜古诗之美妙天真”^①。可见他走的道路与茅盾兄弟是很不相同的。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我认为，这与丰子恺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趋向是密切相关的。“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瞿秋白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夜，中国思想界完成了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分裂”，划分为“国故派”和“欧化派”两个阵营^②。所谓“欧化派”，即以《新青年》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欧化派”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给中国人民送来崭新的思想武器，从而在“五四”时期实现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变。这时候丰子恺在干什么呢？辛亥革命以后，他在崇德县溪西两等小学堂读书，正当外患日深，他曾在老师的带领下高唱《祖国歌》，参加劝用国货的宣传。“五四”前后他正在二十岁左右，处于世界观形成、巩固的重要时期，然而“五四”科学、民主新思潮对他几乎没有什么触动。从1914年到1919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先是埋头认真学习各门功课，后来在李叔同影响下对

① 《〈敝帚自珍〉序言》，1971年。

②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图画、音乐发生强烈兴趣，同时进一步研究中国文学，学习日文；毕业以后，与友人一起筹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在该校教美术；1921年去日本学习绘画、音乐、日文、英文，并广泛参观日本的各项文化设施。由此可见，在“五四”运动前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丰子恺既不像“国故派”那样守旧，又不像“欧化派”那样激进，而是基本上置身于思想革命和政治运动之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专业文化知识、文艺技能方面。这一切为他在不久以后成为一位优秀的文学艺术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却错过了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进步的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极好机会。由于他没有吸收新的文化因素，思想发展缺乏新的动力，所以尽管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历史时代，他的世界观却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主要部分仍是他从小接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我们这样说，意思当然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落后性，实际上，丰子恺身上的优点与弱点，作品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恰恰反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但是无数事实证明，如果始终局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框而没有新旧文化、中西文化的撞击和交融，那么在思想上要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就很困难。尤其是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么无论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还是个人的思想，都不可能有新的发展。丰子恺世界观在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五四”时期没有出现重大变化，其原因即在于此。

二

丰子恺的世界观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儒家的仁学，另一方面是佛家的虚无主义与宿命论。二者相反相成，构成

其世界观的主要矛盾。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世界观大多数是儒道互补，而丰子恺的世界观则是儒释互补，这在历史上也不乏先例，例如宋代的苏轼，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晚年就是如此。当然，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丰子恺的世界观又有自己的特点。

先谈儒家思想。丰子恺出生在一个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就跟中了举人的父亲读《三字经》、《千家诗》，童年时代又受过比较系统的私塾教育，《论语》、《孟子》中所宣扬的儒家仁学思想深深地浸染着他。二十年代初，他在日本东京所憧憬的“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共乐其生活”^①的大同世界，明显地是受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学思想的影响；抗战期间，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表现得更加明显。他以中国古圣贤的“王道”、“仁政”批判日本侵略者的“暴政”^②，认为孟子关于“仁政”的论述“好像是为今日的世间而发的”，确信“最后的胜利还是属于孟子的”，即“仁政”的^③。在许多散文里，他都推崇孔孟的“仁爱”学说，认为“礼乐与人伦，是立国的大本”，而日本军阀凭借新式杀人利器肆无忌惮攻城掠地、杀人放火，乃亡国之道，他们虽然目前横行一时，结果总是寡不敌众，自取灭亡^④。他反复宣传孔子、孟子讲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理，主张一方面“以仁克暴”，一方面“以战弭战，以杀止杀”，鼓励全国军民百折不挠，确信“仁政”必定战胜“暴政”^⑤，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① 《东京某晚的事》，1927年。

② 《漫文漫画·孙中山先生伟大》，1938年。

③ 《漫文漫画·最后胜利》，1938年。

④ 《漫文漫画·亡国之道》，1938年；《漫文漫画·有纸如牢》，1938年。

⑤ 参见《杀身成仁》、《生道杀民》等文，1938年。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对丰子恺的积极影响，首先表现为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仁者爱人。这使他终其一生都对人民大众抱着无限的爱心与同情心，使他不能不关心与注视现实生活中苦难的人民，不能不在自己的作品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丑恶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甚至促使他坚决反抗侵略，主张以正义的暴力去抗拒侵略者的非正义的“暴政”。这一切构成了他在三十年代至抗日战争时期的漫画和散文的积极内容。正是以儒家“仁爱”学说为核心的人道主义与爱国主义决定着丰子恺没有完全超然物外，没有像他的老师李叔同那样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佛教僧侣，而对生活始终持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强烈的爱憎感情。

同时，儒家思想对丰子恺独立人格与高尚品德的形成也有积极影响。孔子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① 孟子提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理想^②。这些在丰子恺身上都有所体现。他一生为人正直，独立自足，不恭权势，不问荣辱，三十年代拒不接待国民党崇德县长的访问，抗战时期又多次拒绝国民党要他作官的诱惑，宁可忍受生活的困难，以顽强的意志孜孜不倦地从事艺术劳动，以赤子之心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这些都足以证明丰子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但是，儒家的一些传统观念，如中庸平和、安贫乐道、怨而不怒等等，对丰子恺也有消极影响。这些观念与佛家的宿命论结合起来，构成丰子恺性格中消极落后因素的主要部分。中庸之道、怨而不怒，使他在现实生活中非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总是竭力回避尖锐复杂的斗争，对丑恶现象较多地止于抗议、谴责而较少

① 《论语·述而》。

② 《孟子·滕文公（下）》。

采取激烈的行动，幻想以抽象的“仁爱”之心来缓和、解决社会矛盾；安贫乐道则使他满足于个人平静、稳定、封闭式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人群，脱离时代，难以接受现代意识，导致思想的封闭性。

1935年，丰子恺在《二重生活》一文中列举种种现象，说明在当时中国社会“人的思想上，生活上，处处出现新旧文化同时并存的状态”。消除这种不调和状态的办法，他认为只能是走“东西洋文化的‘化合’路”，“我们对于各种旧习应该不惜放弃，对于各种新潮应该不怕接受。”在这里“旧文化”、“旧习”都是指东洋文化，“新文化”、“新潮”都是指西洋文化。从文意看，他所谓“西洋文化”主要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东洋文化”主要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实际上，丰子恺本人也处在这种被他批评为不调和的“二重生活”之中，他也未能做到两种文化的“化合”，最多只是貌合神离的混合。对“旧习”，他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放弃的只是“天官赐福”、跪拜礼等枝节；对“新潮”，他只接受物质文明，对民主主义意识形态虽然“不怕”，却并未接受多少。他有浓厚的士大夫意识，生活方式有较多的士大夫情趣，然而这并不影响“蓄音机”（唱机）、打字机、照相机、手表以及钢琴、风琴等西洋“新潮”事物较早进入他的家中；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现代生活方式，然而他在世界观上的儒释互补却始终没有改变。

三

对丰子恺一生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佛家唯心主义思想，这是他世界观中矛盾的主要方面。

马克思指出：“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①。丰子恺的宗教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抗议”与“叹息”，表现着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与疑惑，也表现着他对被压迫人民乃至整个人类的爱心。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大同世界的理想，淡泊宁静的生活志趣，也是与佛学有联系的。

丰子恺接受佛教思想有复杂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与佛学早就形成了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关系。幼年时代曾受到祖母和母亲烧香拜佛、放生施舍等活动的影响，童年时代又受到儒家“仁学”的浸染，这些可以说是丰子恺青年时代确立佛教信仰最初的思想基础。他从小就多愁善感，稍大一些，产生了旺盛的求知欲，开始探索宇宙和人生的秘密。想得多了，又得不到满意的答案，他的心头就笼罩着疑惑和悲哀，他开始相信宇宙间一定有一册大帐簿，“簿中详细记载宇宙间世界上一切物类事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因果果”^②，逐渐走向唯心主义宿命论。丰子恺后来说，对于宇宙人生的种种问题，“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③。这段话本来是他对李叔同出家原因的解釋，其实也概括了他自己逐渐建立佛教信仰的过程。

在宗教信仰方面，对丰子恺影响很大的有两个人，这就是浙江一师的教师夏丐尊和李叔同。夏丐尊多愁善感，“看见世间的

①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② 《大帐簿》，1929年。

③ 《为青年说弘一法师》，1943年。

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①，他后来虽然没有出家为僧，但早已倾向佛学，不时感叹世间的无常。他直接指导、鼓励丰子恺的写作，启发了他的文学才华和忧国忧民的爱世之心，其佛学倾向也影响着丰子恺。李叔同则是引导丰子恺走进佛门的关键人物。丰子恺说：“弘一法师是我学艺术的教师，又是我信宗教的导师。”^②他出家前，丰子恺就对他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深挚的爱国主义情感，对文艺、教育事业的献身精神和严肃认真的人生态度心悦诚服，是他培育了丰子恺的艺术才智和认真的苦学精神。1918年丰子恺和另两位同学送他出家以后，对他更是万分敬佩，赞美他是“行大丈夫事”，从事的是人间最伟大的事业。在二十年代急剧变化、动荡混乱的中国社会里，丰子恺的家庭生活日趋困难，在谋生过程中，他看到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但不知道如何改变现状，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1927年，中国政局发生极大的变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向前发展的大革命惨遭失败，中国进入一个空前黑暗的历史时期。处于黑暗社会和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面前的丰子恺，不能洞察和把握社会发展趋向，不能解答人生的真谛，陷入了彷徨、困惑之中。就在这段时间，李叔同在云游中几次到丰子恺家中小住，师生二人经常在暮色中长谈。1926年暮春，丰子恺与夏丏尊赴杭州，访问弘一法师，聆听他的说教，丰子恺“觉得这次好像是连续不断的乱梦中的一个欠伸，使我得暂离梦境”。这里的“乱梦”、“梦境”都是指丰子恺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的种种痛苦。暑假弘一法师路经上海，又带丰子恺参观他早年住过的城南草堂，丰子恺边看边想：“如果他没有这母

① 《悼丐师》，1946年。

② 《我与弘一法师》，1948年。

亲，如果这母亲迟几年去世，如果这母亲现在尚在，局面又怎样呢？……谁操着制定这局面的权份呢？”由此“感到人生的无常的悲哀，与缘法的不可思议。”^①到1927年秋丰子恺写《剪网》时，思索世界上由各事物间的关系构成的网，“只有把这个网尽行剪破”，才能“认识这世界的真相”，而“艺术，宗教，就是我想找来剪破这‘世网’的剪刀吧！”可见正是在李叔同的点拨下，丰子恺逐渐寄希望于宗教，把自己希冀的理想社会与佛教的“极乐世界”联系起来，幻想在现实世界以外还有超现实的神秘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主宰着自然和人类命运。丰子恺认为只要照佛教教义行事，就可以改变黑暗现实，进入理想境界，找到现实人生的答案。1927年农历9月26日（公历10月21日），丰子恺三十岁生日，李叔同主持仪式，丰子恺正式皈依佛门。

除李叔同和夏丏尊以外，还有一位一般论者较少提到而实际上不可忽视的人物，就是马一浮。这是一位对儒学和佛学均有极深造诣的学者，是李叔同出家学佛的启示者。丰子恺把他比作身居陋巷的颜子，毕生都对他十分崇敬。第一次见面是在李叔同出家前夕，丰子恺陪李叔同走访马一浮，对他们关于佛教的谈话完全听不懂。第二次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丰子恺在谋生过程中已饱尝了人世的辛酸苦辣，“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堕入了颓唐的状态。”马一浮就丰子恺作的《护生画集》进行勉励，就母亲之死为他解释无常，这一次丰子恺完全理解了马一浮充满佛教哲理的话，心中那一团包藏着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丝被马一浮着力地发开，告辞出门时心中十分愉快。第三次访问在1933年，这时丰子恺在现实生活中“似已屈服于‘无常’，不复如前之悲愤，……想对‘无常’作长期的抵抗了”。马

① 《法味》，1926年。

一浮关于“无常就是常”的教诲给丰子恺以极大的启示，“我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怪不得生活异常苦闷。他这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无限的清凉。”^①抗日战争期间，丰子恺与弘一法师只有书信来往，而在马一浮那里却能亲聆教诲，1937年12月避难桐庐时听他“负暄谈义”二十多天；1938年10月，又与他在桂林相聚；1943年春天又专程到乐山访问他。所以，是李叔同引导丰子恺进入佛门，是马一浮帮助丰子恺逐步巩固佛教信仰。

丰子恺的佛教信仰，使得宿命论与虚无主义成为他的世界观的核心因素，这就决定他的人生态度是以出世为主。他在《护生画集》和一些散文中宣传佛教哲学，用佛教的道理来解释人生的坎坷，在宗教体验中解脱现实给他的不幸与苦恼。但是，儒家“仁者爱人”以及佛家“普渡众生”的思想，又使他不能不关注帝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的腐败、人民的苦难、生活的艰辛等等严峻的现实，不可能完全超然出世。这就产生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丰子恺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二重人格的人”，“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中交战”^②，我认为就是指的世界观内部出世与入世这两个互相矛盾着的侧面此消彼长、此伏彼起的复杂变化。

四

从根本上说，作为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现代文艺家而具有佛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落后于时代的要求的。但对丰子恺

① 《陋巷》，1933年。

② 《〈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1946年。

所受的佛家思想的影响，我们应有全面的认识。在中国历史上，自从佛教传入以后，佛家思想对知识分子发生了很大影响。每当社会黑暗时，佛教教义就往往成为正直的知识分子躲避现实的遁逃藪或反抗现实的武器，这在中国历代知识分子中是屡见不鲜的。近现代史上，在丰子恺之前，除李叔同以外，还有苏曼殊，与丰子恺同时，有许地山等人。一般来说，佛家是主张出世的，丰子恺和许地山的人生观念都具有浓重的悲剧意识；然而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在丰子恺、许地山这样的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爱国心的正直的知识分子身上，出世只是他们的世界观的一个方面，有时甚至是比较不重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们始终没有脱离旧中国的苦难现实，他们的人生态度又具有更多的人世的成份。丰子恺的散文表现了这“二重人格”，许地山的小说和散文也是如此。实际上，佛家思想对于他们的影响是相当复杂，再加上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各种思想的交互作用，他们的精神世界显得相当复杂。他们既受佛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在对社会人生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推动下不断前进，如许地山虽然在早期散文中宣扬“生本不乐”，而三十年代的小小说《春桃》却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四十年代初的小小说《铁鱼的鳃》更是被郁达夫誉为“苍劲坚实的写实主义”倾向的“代表作品”。丰子恺的漫画和散文虽然在各个时期都宣扬过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和士大夫的隐逸情趣，然而他从赞美儿童世界、诅咒“成人社会”，到同情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肯定劳动人民的美好品质，再到坚决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强烈憎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统治，谱出了踏实前进的“三部曲”。特别是在三十四十年代，丰子恺一方面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绘制《护生画集》，在不少散文中宣传佛教高于一切，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宗教，另一方面他对“护生”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他对旧社会的